

# 从《摩根索日记》看《华锡借款合同》

刘 达 永

**内容提要** “华锡借款”是1940年由中国政府向美国提出的。促成合约签订的主要原因是双方政治上的需要和经济上的互补性,而并非美国的善意施舍。本文从研究美国当时的财政部长摩根索的日记入手,探讨了这次贷款的全过程。从中可以看出美国提出的苛刻条件和中国遭到的冷漠对待,印证了“弱国无外交”这一真理。

**关键词** 《摩根索日记》 《华锡借款合同》 美国对华政策 蒋介石 罗斯福 胡适 陈光甫

1940年3月7日,美国联邦贷款署署长杰西·琼斯<sup>[1]</sup>宣布向中国贷款2,000万美元<sup>[2]</sup>。1940年4月20日,美国进出口银行<sup>[3]</sup>行长皮尔生与世界贸易公司<sup>[4]</sup>副总经理任嗣达,在华盛顿签订了《华锡借款合同》。在中美学界所撰的专门性教材或著作里,大都提到了这一合约。作者本无意旧话重提,只因暑假夜读《摩根索日记》,目及涉及这一问题的文字,才萌发出“做文章”的念头。

在《合约》签订的前一天,1940年4月19日上午,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sup>[5]</sup>约见了中方谈判代表陈光甫<sup>[6]</sup>,双方作了长时间的交谈。会见快结束时,陈光甫说:“中国的财政复兴是一个大问题。”摩根索接着说:“我了解。啊,我说,我信任你。这对你是件极愉快的事。同时我想要你知道,如果你没有来到这里,中国绝不会获得这笔贷款,绝不能。你要告诉他们,倘若不是因为你,他们一个便士也休想得到。如他们还想得到另一笔钱,你一定得再来这里。”<sup>[7]</sup>

一笔“华锡借款”,摩根索一人就能说了算?美国同意给中国贷款,仅仅因为谈判代表是摩根索所信任的人?摩根索的这席话有悖常理。

其实,中美《华锡借款合同》的签订原因极其复杂,绝非三言两语所能道尽。本文仅就《合约》的主要内容、签订《合约》是双方政治上的需要、《合约》反映了双方经济上的互补性、中美双方的差异性与中国受制于人、《合约》的历史启示等问题,作些尝试性探讨。话题由《摩根索日记》引起;文内资料以《日记》为主。

1939年3月15日,在中国注册的“复兴商业公司”与在美国纽约州注册的“世界贸易公司”,就售购华锡在纽约城签订了一份合同。这份名为《售购华锡合同》的契约,分别由复兴商业公司董

事陈光甫、世界贸易公司副总经理任嗣达签字。按照商业惯例,两家注册公司即可履约销售与购买。实则这两家公司都清楚,它们的“老板”都是中国人。它们缺少最关键的一样东西——硬通货,而若无美国的介入,华锡欲在美国出售也无法进行,《合同》也就如同废纸一张。

1940年4月20日,一份真正可以运作的合约签字生效,即此前述的《华锡借款合同》。合约写明:“兹因世界公司曾于同年3月15日与中国复兴商业公司订立合同(以下简称世界复兴合同),规定向中国采购华锡,运销美国,同时将美国农产品及工业品运销中国,即以该合同附载本约之后,标为附件甲,并认作本合约之一部分。”<sup>[8]</sup>《合同》仅是《合约》的组成部分。

这份奇怪的《合约》有三位立约者:美国进出口银行、在美国注册的世界贸易公司(法律上的美国公司,实质上的中国公司)、中国复兴商业公司。想读者已知其中的奥妙——美国式的“匠心”。

《合约》正文11条,加上附件甲、附件乙、保证书,洋洋数千言。其主要内容是:

(一)贷款数额。“贷款银行允于1941年6月30日以前(倘美国国会继续承认进出口银行为美国国家贷款之代理人时,得展至1941年12月31日以前,随时对世界公司作商业性质之信用贷款,其总数以美金2,000万元为限额,作为1939年2月8日贷款合约<sup>[9]</sup>以外之增加贷款。此项贷款,可直接由贷款银行付给,或间接由其他美国商业银行(以下简称代理银行)经付之。”<sup>[10]</sup>

(二)贷款用途。这笔贷款只能购买“货物整体之大部分系美国境内或其属地所生产或制造”的美国农产品及工业品,“所有采购各该产品之订单,须得银行方面之赞同”。“订购各货品,如有美国大总统依据1939年中立法案<sup>[11]</sup>所禁运之军械、火药及军用品等(纯粹商业飞机除外)时,不得动用本约贷款支付之。”<sup>[12]</sup>

(三)贷款的偿还及利息。《合约》第四条规定,这笔贷款应在七年内还清。世界贸易公司在收到银行贷款后,出据还款期票,每批六种。每批期票按下列数额偿还:“票面总额10%自立票日起于两年内还清;票面总额10%自立票日起三年内还清;票面总额10%自立票日起于四年内还清;票面总额20%自立票日起于五年内还清;票面总额20%自立票日起六年内还清;票面总额30%自立票日起于七年内还清。”关于利息,“利息周年四厘,每半年付息一次”,即每年9月30日及3月31日照付。每次付息,“按照当时未偿部分计算。”<sup>[13]</sup>

(四)担保与抵押。《合约》规定,“所有上项期票之清还,由中国银行作无条件之担保。”<sup>[14]</sup>按照《合同》及《合约》,中方以40000吨(每吨3,000磅)99%净度华锡作抵押。在第一至第七年期间分别交售3000吨,4000吨,5000吨,6000吨,7000吨,7500吨,7500吨。为确保按期偿还,《合约》第五条规定,凡世界贸易公司“依照‘世界复兴合同’所应得每吨华锡售价之净收入,按下列年期分别划拨百分数作为清还期票之用:第一和第二年内均为50%;第三和第四年内均为60%;第五和第六年内70%;该期以后80%。”<sup>[15]</sup>

除上述四点之外,《合同》还对交货地点、时间、实价、付款条件与方式、购方垫款、购方为采购代理人、合同期限、适用法律等等,作了详细规定。《合约》则就由美国商船装运、采购美国锡业机器设备、每季度中方向美方报告销售吨数、起运吨数、价格、售价“净收入”等等,不嫌繁冗的写得清清楚楚。由此可见,《合约》是一份典型的美国式商业契约,中方受到了十分严格的限制。

为什么在1940年4月20日中美两国会有这么一份《合约》呢?

这笔贷款由中国国民政府发端，其政治目的是为了抗日。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法西斯的侵略魔爪不断伸进中国，它占领中国东北地区后又蚕食了中国华北的一些地区。1937年7月7日，它不宣而战，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至1939年9月1日欧洲战争爆发，中国华北、华东、华南的重要城市和一些地区又落入敌手。<sup>[16]</sup>

中国人民对日本的侵略进行了坚决的抵抗。对此，连美国总统罗斯福都大为赞颂：“中国也同样表现出千百万普通老百姓抵御肢解他们古老国家的卓越意志。”<sup>[17]</sup>然而战争是敌我双方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全面较量，“它是对每个民族全部经济力量和组织力量的考验。”<sup>[18]</sup>在战争中精神力量、组织力量极为重要，而精神力量要以物质力量为基础。恩格斯曾经指出：“暴力的胜利是以武器生产为基础的，而武器的生产又是以整个生产为基础，因而是以‘经济力量’，以‘经济情况’以暴力所拥有的物质资料为基础的。”<sup>[19]</sup>由于敌我双方物质力量悬殊甚大，<sup>[20]</sup>中国在当时急需抗战物资。还在1938年秋，摩根索就作出了中国物力“破了产”<sup>[21]</sup>的评估。1939年2月8日中美签订《桐油借款合同》，美方贷款2500万美元。这笔贷款很快就几乎告罄，1939年6月21日陈光甫报告：“桐油借款支配殆尽，美方极明了，所谓未用罄，乃指美货尚未大量来华，因系借款未支而言。”<sup>[22]</sup>为了继续抗日，国民政府八方求援，但当时能够伸手相助的国家又屈指可数。

1939年7月30日，蒋介石电驻美大使胡适，令他寻求贷款：“务请兄等密视美方实际情形，研究美国有无不经国会而径由政府或金融界积极增援我外汇基金之办法，并请即为相机活动，多方策进，如有眉目，并盼电告。”<sup>[23]</sup>9月初，胡适衔命拜会罗斯福，请求美国贷款。胡适说：“在此极其难堪的情态下，我请求总统，贵政府可否同意再给我们注入一笔贷款，一笔救生的贷款。倘如此，那将增强我们的士气，支撑我们的勇气，同时，这将向其它国家表明，美国对中国持同情态度。”据记载，“总统对此有兴趣”，并言“我将晓喻财政部长。”<sup>[24]</sup>罗斯福原则上的表态，说明他在战略上已心中有数；而“晓喻财政部长”，则暗示还须仔细斟酌。

1939年12月蒋介石与罗斯福之间的往来电报能进一步窥视出双方的态度。12月9日蒋介石再电令胡适，继续活动贷款，并令他转送一份电报给罗斯福。电报全文称：

罗斯福大总统阁下：颜惠卿(庆)博士访美，承蒙接待，甚感。敝国经济困难，想在洞鉴之中，务请阁下在最近期内为我设法援助。尤望能借我现款，使中国法币与金融借此得以提高信用，则中华民族他日之再造，对于阁下之高义盛情，更铭感无涯，不忘今日之赐也。<sup>[25]</sup>

罗斯福回电称：

12月19日尊电奉悉。余保证无论何时，美国政府皆愿提供适宜而实用之援助，同时对于远东局势，亦在继续密切注视中。<sup>[26]</sup>

蒋介石的态度比较明确，罗斯福话中的潜台词却比较多。试作如下分析：“在继续密切注视中”一短语，实际上告诉蒋介石，他罗斯福早已“密切注视”到远东局势；而“继续”一词则暗示蒋介石美国眼下还不能作出“提供适宜而实用之援助”。在此先就前者作些分析，对“继续”一词则留在本文第四个问题中讨论。

罗斯福的一位部下曾对贷款一事说过这样的话：“政治上的考虑是至上的。”<sup>[27]</sup>问题正在这里。

国际间政治上的考虑以利益为基础，几无纯粹的友谊。这利益又首先在于分清敌、我、友。1933年3月4日罗斯福出任美国总统后，忙于收拾国内的烂摊子，几尽全力推行“新政”，地球上

谁是敌人谁是朋友自然也在他的脑子里盘旋。在他就任之初,美国政界中绝大多数人仍顽固地视苏联为“红色魔鬼”,对苏充满敌意。罗斯福以他锐敏的政治判断力,明确认定1933年1月30日才上台的希特勒是美国的潜在敌人。他教训美国国务院内阻碍美苏建交的顽固派,要他们特别是东欧司司长罗伯特·凯利,眼睛“看看俄罗斯以西的地方。”<sup>[28]</sup>罗斯福力排异议,美苏终于1933年11月16日建交。这就是政治上的考虑。

在亚洲,谁又是美国潜在的敌人?大家知道,罗斯福公开宣布日本为美国的敌人,那是在珍珠港事变之后的事了。但是,他既然已在密切注视远东局势,他当然注意到了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对中国侵略。实际上罗斯福于1937年10月5日在芝加哥的演说中,已暗示了日本对美国构成的威胁,德意日已无疑是美国的潜在敌人。罗斯福说:

未经宣战,没有预警或任何正当理由,包括大批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市民正在空袭中遭到残酷的屠杀。……有的国家在从未危害过它们的国家中煽动内战,并在内战中支持一方。自己要求自由的国家,正在否定别国的自由。

无辜的人民、无辜的国家正在因为贪婪势力范围和霸权而残忍地当作牺牲,这种贪婪是缺乏任何正义感和人道主义的考虑的。<sup>[29]</sup>

罗斯福不点名地点到了德意日。“未经宣战”,屠杀中国人民的是日本法西斯。想必罗斯福也注意到了日本内阁一阁员的叫喊:日本要“消灭白种人在远东的霸权。”这当然会触及到美国敏感的神经。

按照“我的敌人的敌人是我的朋友”这一政治逻辑,中国在罗斯福心目中已属战略上朋友之列。在事关自己国家安危的问题上,罗斯福和邱吉尔一样,并不糊涂。1941年6月22日邱吉尔在广播演说中疾言:“任何对纳粹帝国作战的个人或国家,都将得到我们的援助。这就是我们的政策!这就是我们的宣言。”希特勒“进攻俄国,只不过是企图进攻不列颠岛的前奏。”<sup>[30]</sup>而罗斯福在1939年9月3日就明确说过:“你们必须从一开始就掌握现代国家之间外交关系中的一项简单而不可变更的事实。任何地方的和平遭到破坏,一切地方所有国家的和平也就处于危险之中。”<sup>[31]</sup>按照这一逻辑,日本侵略中国已威胁到美国在远东、在中国的利益。不许他人称霸,正是不容他人“侵犯”自己的利益。

美国学者迈克尔·沙勒毕竟比官员们坦率,他在《美国十字军在中国》一书中道出了美国的政治战略:

1938年期间,舆论的潮流转变了方向,中国俨然有几分成为以美国为后盾的抵抗日军侵略的象征。这种在观点和政策方面的基本改变,表明了美国官员对中国国民党政权的重要性以及日本可能获胜这一结果有了新的看法。随着1938年的消逝,一项新政策的轮廓逐渐显现出来了,这项新政策的基础的要维护一个可能成为抗日堡垒的亲美的中国。美国希望利用中国为武器,以遏制东京胃口很大的帝国主义扩张。华盛顿希望,用经济援助的办法,可以收到这个效果。<sup>[32]</sup>

1939年11月22日,摩根索的助手怀特就贷款一事献计七条,其中之一是:“虽然这些贷款对中国的战事不能带来生机,但它能加强中国抗击日本的持久力。”<sup>[33]</sup>罗斯福在晚些时候公开说:“在亚洲,中华民族进行的另一场伟大防御战争则在拖住日本人。”<sup>[34]</sup>

“拖住日本人”,期望出现一个“亲美的中国”,这就是美国的政治需要,也是罗斯福密切注视远东局势得出的初步结论。

美国贷款给中国,还有提防苏联的政治考虑。在《摩根索日记》里,有充分的反映。

1938年3月1日、7月1日,1939年6月13日,苏联先后给国民党政府三笔贷款共计2.5亿

美元。中国以锑、锡、锌、镍、钨、桐油、茶叶等等13种物资偿还贷款，本息均为三分。苏联的贷款举措颇使美国紧张。1939年9月22日，美国驻上海的机构送出一份情报到达华盛顿。情报称，“日本秘密情报机构从它在重庆的代理人得到消息，9月4日苏联前外长李维诺夫先生乘飞机秘密到达重庆。”情报还称，蒋介石等50多名高级官员抵机场迎接；李维诺夫带来斯大林、莫洛托夫所写的两封信，商谈德意日苏中五国条约等问题。11月8日，陈光甫拜会摩根索。后者仔细询问了苏联三笔贷款使用情况，并向前者谈及李维诺夫访问重庆一事。陈答称不知此事，表示要弄清实情后再告。11月15日，陈光甫写信给美国财政部的J·H·哈勒斯，称他已从孔祥熙处证实李维诺夫从未到过重庆，近期来访者仅为“俄国贸易代表团”。<sup>[35]</sup>一份假情报竟引起美方忐忑不安，内心深处藏着什么就可想而知了。

利益具有排他性。在苏联的第一、第二笔贷款成为事实后，摩根索在1938年12月6日就对美国副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B·S·Welles, 1892. 10. 14—1961. 9. 24)指出，如美国不贷款给中国，就意味着中国走向苏联。苏联的第三笔贷款协定签字后，种种关于苏联觊觎中国的谣传又吹到华盛顿。1939年11月15日陈光甫否定了那一假情报，11月18日摩根索的智囊怀特向其进言美国贷款将“使中国减少对俄国援助的依赖。”<sup>[36]</sup>而摩根索本人早就说过，拖延贷款差不多等于驱使蒋介石落入“俄国的手掌”。

由此可见，美国决定贷款给中国的政治因素，正是对日本威胁美国利益的惧怕和对苏联援华的戒心。

### 三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没有经济利益，政治需要往往苍白。正是基于中美双方物质上的需要与经济上的互补性，才促成《合约》的签订。

美国对于中国购买什么美国产品极感兴趣。据美方所统计的材料，中国用《桐油贷款合约》的2500万美元，买了以下美国产品：汽车、摩托车及其有关设备791.9213万美元；石油产品462.4万美元；电话、收音机之类电器产品及有关材料202.4608万美元；钢、钢材之类金属品428.3641万美元；卡叽布、棉毯等纺织品160.0993万美元；医疗器械、药品100.076万美元；机械类产品96.3115万美元。运输费、保险费258.367万美元。总计2500万美元。<sup>[37]</sup>《华锡借款合同》签订之后，从1940年5月至12月，中国用2000万美元，购买美国汽车类产品278.7万美元；石油类191.2万美元；医疗设备60万美元；纺织品57.4万美元；机器类36万美元；铁路设备66.6万美元；锡矿机器87万美元<sup>[38]</sup>。所购美货，大都是当时中国缺乏的，有的还是那时中国不能制造或质量不如他人的。无疑，它们在中国前线和后方都起了作用。

反之，美国从这笔交易中获益也不小。

美方首先看中华锡是一种重要战略物资。摩根索坦言：“锡是一种值得重视的军需品”<sup>[39]</sup>，“我们对储备更多的军事物资感兴趣。”<sup>[40]</sup>摩根索多次与他的部下讨论了世界产锡国的分布、世界锡业市场现状等等问题。他们得出结论：“英国、法国和荷兰控制了世界(锡)产量的2/3，‘国际锡业卡特尔’控制A级锡销售的90%以上。鉴于英国实际对控制‘锡业卡特尔’感兴趣，我们的消费者从‘锡业卡特尔’控制之外获得有保证的供应极感兴趣。”<sup>[41]</sup>他们认为，“中国是未参加国际锡业协议仅有的重要锡生产国。中国没有出口额限制的约束，它可以自由的增加锡的生产量和输

出量,以满足美国不断增加的需求。”<sup>[42]</sup>美国财政部的官员们还进一步分析,如每年运装一万吨华锡到美国,虽仅占美国年消费量的1/5强,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爆发,锡又受国际锡业协议控制的严峻情态下,华锡“独特的供应方式与保证”,对美国极为重要。如果锡自身用途不大,国际行情不抢手,美国会同意这种交易吗?

美国官方还论证了这笔交易对美国制造商、生产者的好处。他们认为“拟议中以锡抵押的新贷款”,可使中国“继续购买所需的物资,这对美国制造商、生产者与中国,相互都是有利的。”<sup>[43]</sup>

一笔购买美国货2000万美元的生意,对当时美国经济的复苏,肯定也是“注入”。自1929年美国发生经济危机以来,在罗斯福“新政”推动下经济渐有起色。1937年9月至1938年8月,一场“罗斯福衰退”(Roosevelt Recession)又使美国吓出一身冷汗。1939年全美失业948万人,占劳动力的17.2%;1940年失业812万人,占劳动力的14.6%。<sup>[44]</sup>1939年美国国民生产毛值905亿美元,1940年997亿美元,均未超过1929年的1031亿美元,亦未如1941年的1245亿美元。<sup>[45]</sup>罗斯福的“新政”专家们曾说过,一块美元只要能起作用,就可使经济复苏。中国购买2000万美元的美国商品,不正是对美国经济的“注入”么?而且“注入”得还正是时候。

当时国民党政府的一些高级官员、谈判代表,深知于此。1940年1月30日孔祥熙电告胡适、陈光甫:“至借款运用方面,总、财长、外长既允力为协助,则国会方面务托有力友人多方活动,想在美方希望我国胜利及借款购美货可协助美方工商两原则下,必能博得多数同情,而加赞助也。”<sup>[46]</sup>中方谈判代表奉命以此两原则与美方周旋。据胡适、陈光甫向孔祥熙报告,效果不错:“昨日琼斯在国会陈说增资案,亦言我国履行借约,信用良好,裨益美方工商,国会中印象尚佳。”<sup>[47]</sup>

#### 四

由于华锡借款的提出者是中国,中美之间从一开始所处的地位就不同等。中国是求人者,因而处于被动地位,处处受制于人。限于篇幅,这里只列要点。

(一)美国首先考虑自己的战略利益。罗斯福曾公开谴责他国内的利己主义者,说“他们总还会首先考虑自己,其次考虑到他们的同胞。”<sup>[48]</sup>这句话可以借来观察美国对外国、对当时中国的态度。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先欧后亚”战略,从罗斯福于1933年11月承认苏联已看出一点端倪。1940年1月美国贷款给芬兰,则是这个战略的序曲。“先欧后亚”自有全局,核心是为美国自己。在这种战略指导下,无论中国如何受日本侵略之苦,无论中国心急火燎地请求贷款,美国都不会采用“先亚后欧”。罗斯福只是“继续”密切注视远东局势,美国当时在远东的战略只求中国“拖住日本人”。因此就出现十分奇怪的现象:美国对日本侵略中国宣布中立<sup>[49]</sup>;但又谴责日本侵略行径损害了美国的“机会均等,门户开户”原则,不承认日本的“东亚新秩序”;然而又让日本从美国购进大量“废铁”、汽油等战略物资。深怕如“支持”中国超过一定限度,就会得罪日本人,从而对自己不利。因此,早在《桐油借款合同》签订前,美国国务卿赫尔(Cordell Hull, 1871. 10. 2—1955. 7. 23)、国务院远东事务科科长马克斯韦尔·汉密尔顿就持反对态度。“他们声称,提供这笔贷款既会引起日本反感,又对中国没有很大帮助。”<sup>[50]</sup>1939年9月1日欧洲战争爆发,波兰很快即被德、苏瓜分。1939年11月30日至1940年3月12日,苏芬之间爆发一场战争。而在亚洲,日本大肆进攻中国。两相权衡,美国不得不“适宜而实用”地“支持”中国,因为它担心会失去它在中国的利益,进而失去在远东、亚洲的利益。

即使如此,美国仍奉行“先欧后亚”战略。可以说,《华锡借款合同》是这一战略的附产品。1939年11月30日苏芬战争爆发,小国芬兰不敌大国苏联。芬兰派出部长阿姆斯向美国求援。美国国会吵吵嚷嚷六周之后决定向芬兰贷款。1940年1月25日美国参议院财政委员会通过了《布朗法案》(Brown Bill)。在法案通过前,摩根索向罗斯福进言:“何不对中国做一些事?”罗斯福回答说:“你完全正确。但你若试着这么干,你将扼杀对芬兰的贷款。”<sup>[51]</sup>谁的份量重,谁的份量轻,美国心中有数。有了《布朗法案》,华锡贷款才有了立法根据。<sup>[52]</sup>国际间在利益面前的残酷逻辑,又是一例。

(二)美国强调法律程序。胡适于1939年9月初拜访罗斯福请求贷款。这位总统表示他愿意“在法律范围内做有可能促成此事的一切事情。”<sup>[53]</sup>这是典型的外交辞令。中国急于求成,美国却说我得按美国法律办理。1939年11月20日怀特就贷款的法律手续向复兴投资公司的弗利(E·H·Foley)询问,后者据《复兴投资公司法》第五条第四款回复:美国贷款机构可贷款一笔钱给美国公司购买华锡,然后在美国出售。于是才出现前文所说的进出口银行贷款给世界贸易公司,而该公司又与中国复兴商业公司签约的怪事,尽管世界贸易公司仅挂“美国公司”之名。

蒋介石一心想不通过美国国会而求得贷款,美国则说不行。陈光甫向孔祥熙报告说:“故现在借款手续有如向一公司接洽要事,罗为董事长,毛(按:即摩根索)、赫(按:即赫尔)常务理事,琼(按:即琼斯)总理,国会有如股东会,人多口杂。彼等适逢选举年度,顾忌特多,即未开国会时,亦不便自由举动。美国外交常受国会影响,此为一例。”<sup>[54]</sup>别人按自己的法律办事,求人者还能说什么呢?

(三)中国急于取得贷款,美国则说我要论证这笔交易的商业可行性。美国的这种论证,足令中国人吃惊,但在当时只能让别人“论证”。限于篇幅只列要点:美国疑虑中国与日本“议和”;国民党政府是否稳定<sup>[55]</sup>;中国抵押的滇锡、桂锡质量如何<sup>[56]</sup>;中国是否有足够的交通工具、交通状况如何<sup>[57]</sup>;美国贷款给中国是否有风险、风险多大<sup>[58]</sup>;等等。

综上所述,当时中美双方地位的差异就是矛盾,有矛盾就有斗争。然而当时的中国是弱国,既遭国难,又求于人,在谈判时能拿什么去和对方“斗争”呢?受制于人的悲剧也正在这里。

## 五

经过美国的种种琢磨与论证后,一笔姗姗来迟的贷款才最后敲定。50余年前的《华锡借款合同》已是历史。历史就是历史。但历史又不仅仅是历史,它留给我们的不独是叹息声声,更给我们以思考,启迪我们把握今天,展望明天。

当时的中方谈判人留下的一些话,几分凄楚,几分遗憾,让我们久久思索。

陈光甫在办完贷款事后,电呈蒋介石,感叹万分:“国际间无慈善事业。……今后抗战必须基于自力更生之原则”,“我先自助,人方助我,否则,求人之难若登天。”<sup>[59]</sup>这是谈判代表的切身体会。《摩根索日记》里反映了胡适、陈光甫的心态。1939年9月26日胡适拜访摩根索。胡适详尽回顾了与罗斯福会谈时所涉及的问题,并就华锡抵押事陈述国民党政府掌握年产1.3万吨锡等情况。摩根索一听有利可图,马上说:“大使先生,我已等了你两周,想听听你的见解。”胡适说:“这事太烦扰人,我不敢来拜访你。我知道你很忙,很忙。这也是我不敢冒昧见你的原因之一。”<sup>[60]</sup>一位堂堂大使,会见一位驻在国政府部长,在礼节上应不是问题。胡适的胆怯心态说明弱国求人之

难。陈光甫对胡适的处境深为了解,他谈到美国国务院“亚洲问题”专家项白克(Stanley·Hornback)对胡适的态度:此人“对话之说话,有如老师教训学生,可见做大使之痛苦矣。”<sup>[61]</sup>应该说,这是一个弱国大使的痛苦。

陈光甫本人亦有此切身经历。《合约》签字前的一天,陈光甫拜会了摩根索。双方谈谈公务,又闲聊其它。其中一段对话,令人感叹。

摩根索:你在这个国家已停留很久,你得到了许多东西,你已经学到了美国式的计谋。

陈光甫:我,……我……

摩:我也想到中国学一些你们的文化。

陈:那里无文化,你来帮助我们吧。

摩:我想学你们的文化,你们的哲学。

陈:你太好了。<sup>[62]</sup>

陈光甫临走还留下一句话:“随时听你的召唤。”

中国无文化?陈光甫是不是在出卖祖宗?看来他是出于无奈,为讨好摩根索而口出此言。1939年《桐油借款合同》签订之后,这位谈判代表在日记中表露了心态,《中国外交史》一书多加以间接引用:他在美国求援,犹如赌徒下注,日夜揣度美方人士喜怒心理伺机进言,以博取好感,不敢稍有疏忽。对罗斯福更是诚惶诚恐,轻易不敢启齿,“深恐其情绪不佳时,说一‘否’字则一切都完,从此断路。”<sup>[63]</sup>求人难,跃然纸上。

1940年3月5日,陈光甫把《合约》草案转呈重庆。国民党政府内有人对《合约》的一些内容不满,尤对中国银行担保、美方厚芬兰薄中国等等颇有微词。时改任行政院副院长的孔祥熙电令陈光甫复与美方交涉。胡适得知后大发牢骚,把他在交涉过程中吞下的“洋气”一股脑儿倒了出来。3月25日胡适电告孔祥熙:

此次借款用锡作抵,此意实由政府发之,自九月至三月,兄与光甫兄往来电报盈尺,均无异议,改期谈判始依原议进行。今借款七日始发表,而八日尊电忽令变卦,光甫兄与适此时实难如此翻覆。即向美当局开口,非但无益,定使毛财长及琼斯诸人为难,势必因彼等已逃向国会及报界宣称我国按期付款,此次借款以锡作抵,全商业性质,彼等实亦无法翻覆也。尊电所云中美人云云,当局外人不明实情,轻易主张,未可轻信。适与光甫兄事事合作,深知此中困难,故特电陈,务乞复核十四日英文电,速电光甫兄依原议进行,商订合同,以免贻误事机。此事至关重要,故敢直陈胸臆,千乞垂听。<sup>[64]</sup>

孔祥熙得电报后已感胡适、陈光甫心中不满,乃于3月27日复电,孔祥熙既为自己辩解,又安抚胡陈二人。电文称:

但自欧洲战争发生,美方增援中、芬热烈。借款同出增资议案,中、芬同为抵抗侵略,美方对芬并无担保显已脱离商业性质而趋于政治援助之途径。此种情况,内外皆知,国内诸人,对此极为注意。……就政治言,应因时制宜,利用机会,并非变卦。即兄等奉令磋商,亦不得认为翻覆也。公忠如两兄,想亦有此同感。弟个人对两兄贤劳困难实情,极为深悉,情形如此,倘不有所磋商,势必惹起误会,参政会开会即在,更恐引起质询,势将无以为对。倘若言而无效,则我等责任已尽,亦属问心无愧,迭电奉商实缘于此。滇锡抵价,当然照办……至于中国银行担保,虽云系属形式,然过去因美方开例,其他各国均欲照例,……此节关系颇大,如能设法治免最好。率直奉复,并请转述光甫兄为荷。情形如何?仍希电复。<sup>[65]</sup>

孔祥熙深感事关重大,3月28日书呈蒋介石,内称:

关于美借款磋商改善条件一事,迭经电达胡大使及陈光甫兄洽办,并经先后而陈尊察在案。兹据胡大使复电,陈述难以磋商,请求仍照原议进行,早日成约等情。弟深恐有所变,故已将实情先复一电,谨将来往两电缮呈垂察。此事究应如何决定?仍乞赐示祇遵。肃颂崇绥。<sup>[66]</sup>



向美国请求贷款始于蒋介石的主意,《合约》草案拟成后要求修改某些条款的也经蒋介石的同意,眼下经办人胡、陈不肯再与美方交涉,蒋介石闻讯后只得饬令孔、胡,一切照美方条件办理。1982年,一部纪念罗斯福诞辰100周年的美国权威学者所撰的著作出版,在谈到抗日战争时期中美经济关系时,说了一句令国人难堪的话:“从一开始蒋介石在罗斯福面前就是一个乞求者。”<sup>[67]</sup>

人们常言:弱国无外交。弱国面对敌国,固无外交可言。弱国面对并非敌国、有如盟国之强国,也谈不上外交。

50多年前的那一页历史毕竟已翻过去了。我们不宜责难办交涉的人。我们惟有基于自力更生之原则,惟有增强自身的国力,在国际上方不被他人欺侮。我们将谱写新的历史篇章,以不负后人。

### 注释:

[1][5][66] *Franklin D. Roosevelt His Life and Times*, 1985, by G. K. Hall co, pp220—222; pp265—267; pp57. 据该书介绍, Jesse Holman Jones (琼斯, 1874. 4. 5—1956. 6. 1), 是一位金融家、银行家, 罗斯福“新政”信贷领域的“大帝”。早在胡佛担任总统时, 琼斯已在 REC 供职。罗斯福上任后, 琼斯即为推行“新政”效力。根据 1939 年的“改组法”(Reorganization Act of 1939), 成立了“联邦贷款署”(Federal Loan Agency), 琼斯被任命为这一机构的长官(Administrator)。他指挥复兴财政公司(RFC)、进出口公司(EIC)等等贷款机构。Henry Morgenthau, Jr. (1891. 5. 11—1967. 1. 6) 罗斯福的邻居、密友、财政部长。罗斯福任纽约州州长时, 摩根索就在他麾下掌管农业。罗斯福出任总统后, 摩根索初任“农场管理局”及其继承机构“农场信贷管理局”的主席; 1933. 11—1934. 1. 任财政部代部长; 1934. 1—1945. 7 任财政部长。罗斯福于 1945 年 4 月 12 日谢世后, 杜鲁门仅留任他几个月。

[2][7][24][33][35][36][37][38][39][40][41][42][43][51][54][60][62] *Morgenthau Diary (China)*《摩根索日记》(中国)volum 1 Da Copo Press, New York, 1974, p. 100, p. 117, p. 15, p. 55, p. 54, pp. 11—12, p. 45, p. 118, p. 118, p. 18, p. 88, p. 55, p. 52, p. 53, p. 78k, p. 22, p. 15, p. 116—117.

[3] 据 *The Encycloedia of American History*, 1953, Harper and Brothers Publishers, P. 346; 进出口银行建于 1934 年 2 月 2 日; 据 [1], P. 301, 进出口银行于 1934 年 2 月 12 日成立; 而《美国两百年大事记》, 1984, 上海译文出版社, 第 344 页, 与 [1] 所说相同。

[4] Universal Trading Company, 有的译为“环球贸易公司”。本文采《合约》之说。它是中国复商业公司在美国纽约注册的一个公司, 因此它被美国视为“一个美国公司”。实际上, 它是中国国民党的商务代理机构, 其业务为代理中国各机构在美国的订货, 动用美国贷款支付所购商品的费用。该公司的大部分雇员为美国公民, 这些人曾任职于美国政府机构。

[6] 陈光甫时为上海商业储备银行的总经理, 又是中国复兴商业公司的董事。他在美国商界有一定声誉, 加之他的身分, 很宜担任谈判代表。有一次, 他带着“世界贸易公司”副总经理任嗣达与摩根索谈判。

[8][10][12][13][14][15]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 1962 年, 三联书店出版, 第三册, 第 1156 页, 第 1156 页, 第 1156—1157 页, 第 1158 页, 第 1151—1152 页。

[9] 1939 年 2 月 8 日, 美国进出口银行与纽约世界贸易公司在华盛顿签订了《桐油借款合同》, 美方贷款 2, 500 万美元给该公司, 中方以桐油作抵押。在 1938 年 10 月 12 日该两公司又在纽约签订了《购售桐油补充合同》; 实际上, 这是两家中国公司间的合同, 只不过世界贸易公司在美国注册而已(见 [8] 第 1121—1125 页, 第 1150—1151 页)。

[11] 美国国会在 1939 年 11 月 4 日召开的一次特别会议上通过了一项联合决议。该决议废除了 1937 年《中立法》中关于武器禁运的条款。新的《中立法》允许交战国在美国购买武器, 但应付现款, 并用自己的船只运输。此

“现款自运”恰恰卡住了当时的中国。因中国既缺外汇,又无远洋船只。而侵略中国的日本有外汇,有远洋输船。此《中立法》中立乎?

[16]据《中国抗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刘庭华编著,1988年海军出版社。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占领了天津、张家口、保定、石家庄、包头、邯郸、太原、烟台、无锡、镇江、南京、扬州、合肥、杭州、济南、武汉、长沙等重要城市,及一些地区。

[17][29][31][34][48]关在汉编《罗斯福选集》,198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第288页,第151—152页,第225—226页,第261—262页,第64页。

[18]列宁《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200页。

[20]同[16]第475页:1937年七七事变前中日两国部分国力比较如下:工业总产值:日本60亿(美元);中国13.6亿;钢铁,日本580万吨,中国4万吨;煤,日本5070万吨,中国2800万吨(其中55%为外资);石油,日本169万吨,中国1.312万吨;铜,日本8.7万吨,中国700吨;飞机,日本1580架,中国零;大口径火炮,日本744门,中国零;坦克,日本330辆,中国零;汽车,日本9500辆(设备能力3万辆)中国无制造能力;造船能力,日本47.32万吨,中国,不详;造船能力,日本52,422吨,中国,零。中日军力比较:陆军5.7:1(日军人员少,但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空军1:8;海军1:13。

[21][美]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的对外政策》1932—1945,上册,第275页,1984年,商务印书馆。

[22][23][25][26][46][47][54][63][64][65]《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一)第252页;第253—254页;第260—261页,第261页,第263页,第265页,第264页,第268页,第269页,第270页。

[28](苏)亚·鲍·恰科夫斯基《未完成的画像》,1984年世界知识出版社,第116页。

[30]《邱吉尔回忆录》(第二次世界大战部分)。

[32][50](美)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商务印书馆1982年中文版,郭济祖译,第21页,第29页。

[44][45] *The Statistical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from colonial times to the present*, 1976, Basic books, New York, p, 135, p, 224.

[50]1935年8月31日,1937年5月1日,美国会先后通过《中立法》。1937年9月14日罗斯福专电“不准向中国或日本运输…武器、弹药或战争工具”发表声明,详见[17]第145页。1939年《中立法》见[11]。

[53]“布朗法案”即一般所说的“增资案”。该法案要求给进出口银行增加一亿美元,以供贷出。修改后的法案提出三点限制:一笔贷款总数不得超过3,000万美元(据此,中国原请贷款7,500万美元即受此限);进出口银行的任何贷款须经美国国务院作出未违反国际法的解释;贷款不得违反1939年中立法。据[22]第264—265页,1940年2月2日胡适、陈光甫向孔祥熙报告,“因国会议增进出口银行资金不过一万亿元,芬兰、北欧及南美均有需求,……(中国)但至多似在3,000万左右。……惟此项增资专用购买美货之目的,屡经琼斯、庇亚生及有关人员声明,现增资尚未通过以前,关于借款偿还美债之议,似难提出”。

[55]1939年10月18日,胡适电呈蒋介石,报告美方疑虑:“惟近来美国政府收到各方情报,或谓和议有望故法币汇价近勿增长,或谓我政府不久即将改组,行政院与外、财两部,均将换人,故六中全会提早于11月开会云云。适窥测美政府领袖,似不免因此稍存观望。关于和战,适已将最近兄等所示确讯传达,惟六中全会是否提前,政府是否改组,倘蒙询明密示,俾可真相解释疑虑”(见[22],第259页)。

[56]1939年11月12日,怀特向摩根索报告,称华锡大多为C级,不符合美方要求(据[2],P.55)。因此在谈判中,美方提出美国厂家惯用A级锡,华锡是否为美国厂商满意还可作技术试验。为改进华锡质量,中方保证在贷款中拨出“200万美元,作改良锡产之用”。《合约》规定中方提供九九成色净锡,缘于此。

[57]1939年10月4日,陈光甫与摩根索会谈中,摩根索说,你们的大使上周拜会总统,曾说到“我们没有足够的运输工具通过滇越铁路”。然后,摩根索不容气地说:“如果你们没有足够的运输工具通过滇越铁路,凭什么

借钱给你?”(据[2],P.18)另外,《摩根索日记》多处记载有关中国交通状况的报告,其中有美国驻香港商务专员 M·R·Nicholson,美驻重庆大使馆领事 W·R·Peek 的报告,彼等对中国交通运输状况不满,此将影响货物的进出。1939年9月以 M·E·Sheahan 为首的公路专家代表团到达中国,行程3万里,费时45天,足迹遍云、贵、川及缅甸。此人向美国发回四份报告,并于1939年11月30日在重庆发表谈话,对中国交通说了一些好话,称赞中国公路有所改进。Sheahan 到达重庆后,蒋介石、宋子文等不少高级官员接待,殷情有加。但美官方仍不满意,直到《合约》签订的前几天,琼斯对陈光甫说,“购货堆积海防,无异浪费资金”,“彼对于我方运输极感不满”。陈只得“告以今后交通必可较前通畅”。详见[2]PP.61—62,PP.41—42,PP63—64,又见[22]第266—267页。

[58]1939年11月22日,怀特专就“锡贷款”问题,向摩根索呈送一份报告,其中一条涉及贷款的风险问题。怀特说,(A)按照C级锡每吨750美元的价格每年中国运1万吨抵美,10年10万吨,可贷款7,500万美元给中国。为保险,以贷款3,500万美元较妥。(B)如果日本摧毁了中国中央政府,这笔贷款危险极大(jeopardized);如果出现和平,无论(国民党)中央政府,或傀儡政权,都不愿中止供应锡,因为他们都希望从美国获得进一步的贷款。(C)最大的风险是日本完全封锁了中国通往世界的通道,或共产党人控制华南产锡地。见[2],P.55。

[59][61][63]吴东之主编《中国外交史》,1990年,河南人民出版社,第二册第461页,第457页,第457页。

(上接第84页)

[18][21][22][23]《文学与宗教》,《周作人回忆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71—374页。

[19]周作人《宗教问题》,《少年中国》2卷11期,第6—8页。

[20]周作人《艺术与生活·圣书与中国文学》。

[24]周作人《谈虎集·北沟沿通信》,岳麓书社1989年版。

[25][27][28]周作人《关于非宗教》,《谈龙集、谈虎集》第227页,岳麓书社1989年版。

[29]《批评非基督教运动言论汇刊》(《真光杂志》特号,1922年5月),第41—46页。

[30]《北京非宗教大同盟宣言》,张钦士辑《国内近十年来之宗教思潮》,燕京华文学堂1927年版,第193页。

[31]同上引张钦士书,第201页。

[33]周作人《谈龙集、谈虎集》,岳麓书社1989年版,第226页。

[34]蔡元培在北京非宗教大同盟的演讲,见前引张钦士书,第200页。

[36][38]王星拱等《非宗教者宣言》,《晨报》1922年4月4日。

[37][42]《主张信教自由宣言附识》,《批评非基督教运动言论汇刊》(《真光杂志》特号,1922这5月),第41—46页。

[39]参看这一时期陈独秀发表的《基督教与基督教会》,《基督教与中国人》等文。

[40]《广东群报》1922年5月20日。

[41]《广东群报》1922年4月10日。